



品味 红色经典 17

《游击队歌》为何让我们心弦共振

廖昌永(上海音乐学院院长)

《游击队歌》旋律流畅活泼,以富有弹性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,具有进行曲风格,描绘了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艺术形象,表达了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



出这样的作品。历史一次次证明,无论哪个年代,艺术源于生活都是一条铁律。只有深入生活,扎根人民,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,艺术家只有将自己的全身心与国家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,作品才可能焕发长久的生命力。

对我而言,在不同年代唱响《游击队歌》,感受也不一样。年轻的时候唱这首歌,我只觉得好听、带劲。1988年,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,尤其是一想到《游击队歌》是老院长的作品,就更有亲近感,也有了责任感。如今30多年过去了,作为当年的学子、今天的教师,我一直在思考:我们今天唱响《游击队歌》,到底意味着什么?我们该如何传承光大这优良的传统?

在学校时,贺院长曾一对一指导我唱《嘉陵江上》。我记得,不论走到哪里,他都随身带着小本本,记录各种民族民间音乐素材。他常说,自己脑子里记得上千首歌,不论创作哪种类型的作品,都能随时调用。理解了他的创作,我们就能明白,为什么《游击队歌》传唱至今、经久不衰?因为它让我们心弦共振,激励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走向革命的前列。

贺绿汀是我们敬爱的老院长。此前,上海音乐学院排演了歌剧《贺绿汀》,向今天的人们讲述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的故事。去年夏天,我们将歌剧《贺绿汀》拍成实景电影,以此向前辈深情致敬。贺绿汀由我饰演,角色全部由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出演。从排演到拍摄的整个过程,我们对这位为人民音乐事业耕耘一生的艺术家、师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他对专业的敬畏、对艺术的敬畏、对人民的崇敬、对时代的崇敬,深深感染、教育了我们。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,因为这部戏,真正走近贺绿汀当时生活的年代,全方位感受到他的艺术追求和人格魅力。就像当年的革命战士一样,整个剧组以最昂扬的热情创作着,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,努力把作品完成好。

生活是最好的课堂,祖国是最广阔的舞台。每年暑假,我们都有10支校级队伍进行暑期社会实践。有一位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学生,在赴河南兰考参加慰问演出后,对我说,这是他最难忘的一场演出。他站在农村的大篷车上,台下全是父老乡亲,那一刻,真正感受到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。那一刻,他更理解了歌剧《贺绿汀》里的歌词:“祖国大地就是我们的舞台,这里,就是最好的音乐课堂。”

时代呼唤着我们,时代也考验着我们。今天再来唱《游击队歌》,意义更加不一样。接过历史的接力棒,用优秀的文艺作品记录新时代、书写新时代、讴歌新时代,为新的百年征程注入精神力量,我们责任在肩、使命在肩。

(本报记者曹玲娟采访整理) 图片自上而下为连环画《铁道游击队》封面、《游击队歌》曲谱手稿

4月30日,电影《悬崖之上》全国公映,揭开“五一档”的序幕。张艺谋首次触碰谍战题材,张译、于和伟、秦海璐、朱亚文、倪大红、李乃文等演员实力演绎,这个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隐蔽战线上的故事,一次次让观众眼眶湿润、心生敬意。

如何跳出类型片叙事的套路?怎样讲述无名英雄的信仰与牺牲?文学叙事与电影美学如何合二为一?日前,张艺谋接受了我们的专访。

“拍《悬崖之上》对我是很好的锻炼和提高”

记者:电影《悬崖之上》的开机仪式上,您曾说:“我们有很好的演员、很好的故事,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,我们的电影也会很精彩。”如今电影公映了,它达到您心目中的精彩了吗?

张艺谋:我觉得达到了。所有的工作人员,尤其是演员,付出了艰辛的努力,呈现了人物应有的光彩。但说句心里话,我对自己非常苛刻,我几乎从没有一部电影,自己认为是十全十美的,所以,我下一次还要再努力。

记者:这部电影里有比较令您满意的地方吗?

张艺谋:首先是故事比较好。它的起承转合、反转悬疑设计得好,故事情节会一直“牵”着你走。即便你已经熟知了一些情节和大概走向,还是会被吸引着看下去。第二是表演好。全片11名主要演员,不分角色大小,完成度都很好,这在我的导演生涯中是第一次碰到。通常一部电影只要“保”几个人物就好了,但《悬崖之上》是一部群像戏,每个人的银幕时间都不长,只有演得恰到好处,演出隐忍之下情感涌动,才可能牢牢抓住观众。

记者:《悬崖之上》的编剧全勇先,也是热播电视剧《悬崖》的编剧。他笔下这个关于隐蔽战线的故事为什么打动您?

张艺谋:我选择剧本是随机的,有人推荐了全勇先的这个剧本,我觉得基础不错。最初这个故事比较残酷,重点写几个深入险境的地下工作者如何求生与挣扎,“乌特拉行动”几乎弱化成背景。后来我和他一起改剧本,在现场,演员也帮着改了一些小细节,着重突出了谍战片的特色和“乌特拉行动”这条主线。

在俄语中,乌特拉的意思是黎明。我们说,岁月静好,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。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,就是无名英雄的牺牲。因为这些革命先烈的牺牲,我们才能迎来黎明,过上今天的美好生活。影片做观众测试的时候,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触及牺牲这个话题。有了这样的共鸣,这部电影的意义也就放大了。

谍战片的任务非常清晰,在为完成任务的前赴后继和英勇牺牲中,革命信仰被托举了出来。影片中的信仰不是空洞的,它是在讲故事当中,循序渐进地让观众信服:信仰就是为了黎明,信仰就是为了胜利,信仰就是为了明天更美好!不能说教,故事来带动,人物来带动,观众的体会才真实。

记者:以往的谍战片往往靠悬念推动故事,《悬崖之上》却是“反套路”的,甚至十分大胆。故事上半场就已经揭开谜底,如何让观众保持着下去的愿望?

张艺谋:这的确很难。创作前期我们讨论认为,网络时代里,没有不被“剧透”的剧。现在单纯靠一个悬念、靠一个包袱来吸引观众,不大可能了。所以,当观众清楚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,知道了所有反转的可能,甚至真相大白之后,还有看下去的必要吗?如何用情感、用情节、用过程,用细节的铺排来吸引观众,并且让人看得惊心动魄,这是对编剧和导演最大的难题。拍《悬崖之上》对我是很好的锻炼和提高。谍战片,尤其考验导演用现实主义手法讲故事的能力和掌控力,以及对演员的引导。我们称之为“攻坚战”,就是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,一步一步扎实地往下走。

来自现场的声音

电视剧《小舍得》播出后,与《小别离》《小欢喜》一样受到关注。荧屏里的那些面孔、声音与心事,化为坊间热议的话题漂流在街巷中、楼宇间、餐桌上。作为原著作者的我,观剧时更是五味杂陈。有人曾问我和电视剧创作者:“这些年,为什么持续关注教育题材?”我的回答是,并非刻意去寻找,而是这个关涉亿万家庭的现实题材找上了我们。

“小系列”的创作,来自社会热点的触动。6年来,“留学热”“起跑线之争”“亲子关系”等热点话题相继进入我们的视野。曾经的媒体人经历,促使我们去品味热点背后的时代投影。2014年,上海浦东机场“小候鸟们”与家长依依话别的场景;2016年,浙江镇海中学老师感慨“社会发展飞快,家长的经验不够用了”;更别提,媒体上关于“课外补习现象”的连续报道,都引发了大家的普遍共鸣。我们的笔触或镜头就以这些热点为



“心里的丰碑是永远的丰碑”

——对话导演张艺谋

本报记者 任姗姗 苗苗



色彩选择首先要准确,绝不是单纯地“玩色彩”

记者:影片还在人物关系上用了大量笔墨,呈现了谍战片少有的情感浓度。比如,张宪臣(张译饰)与周乙(于和伟饰)生死相托,王郁(秦海璐饰)得知丈夫被捕遭受酷刑,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无声哭泣等,成了观众反复咀嚼品味的桥段。

张艺谋:这部戏表现了夫妻、父子、母子、情侣各种人物关系,每一场戏的比重都不同,像战友情感就是以死相托、舍我保你。谍战片要保持高概念的架构,所以不能大篇幅表达情感。这部片子里,所有的表演都是隐忍的,甚至是反向的,含而不露的,是跟着情节走的。把情感与情节交织在一起,坦率地讲,挺复杂。

很庆幸,我遇见的都是非常好的演员。大家反复讨论剧本,把人物吃透了,到现场就常常有惊喜。像王郁隐忍哭泣的那场戏,她的哭不仅在于丈夫被严刑拷打,极有可能牺牲,还在于被骂做叛徒,可能是冤假错案,这个情感很复杂。我跟秦海璐交流,人生悲痛莫过于此。怎么演?两分钟,她拍了一条,我就感觉成了。很多优秀演员的表演,

众,并且让人看得惊心动魄,这是对编剧和导演最大的难题。拍《悬崖之上》对我是很好的锻炼和提高。谍战片,尤其考验导演用现实主义手法讲故事的能力和掌控力,以及对演员的引导。我们称之为“攻坚战”,就是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,一步一步扎实地往下走。

故事里的暖光

鲁引弓(作家)

起点,并以此为“小系列”带来时代视野和浓郁烟火气。

“小系列”的创作,还来自对现实生活的深挖。我们像媒体人一样,持续深挖题材。如调研沪、杭几十家教育机构,深度采访200多位家长和学童,将其化作《小舍得》中的真实细节和人物逻辑。又如,在对长三角数十所城市中学、小镇中学、山区学校的走访中,我们与近300位中学生面对面交流,看到了各种“少年心事”,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《小欢喜》的人物原型。有时,一句无心之语就为剧中人物找到了“内心的钥匙”。

“小系列”的创作,也来自与受众的互动,包括他们的直接点赞。《小别离》的热播,使“小系列”从一开始就拥有了垂直受众人群,他们的审美需求让创作带上了网络时代内容生产的互动因子。《小舍得》就起步于公众的期待:2016年,我随手在朋友圈转发一则关于“课外补习

现象”的报道,结果出现了大量跟帖、点赞。很多人跟我说,可以写写这个题材,写写“补习的苦和难,写写我们这些家长”。收集素材时,这些点题的朋友甚至主动带我去培训机构调研。这样的采访让我明白:当文艺关注大众所关注的生活,大众就会关注文艺的存在和价值;如果作品无法产生热度,也许是因为你离他们还不够近。

“小系列”的创作,是因为与普通人的共情。今天的影视作品,唯有真实才能打动观众,“小系列”以真实叙事为目标,意味着它得直面生活的表象,直面普通人的真实处境。我们努力深入人物的内心,如《小舍得》中,随着“补习”的加码,南俪等人在“舍”与“得”之间彷徨,令观众代入到他人的生活中,以他人的经历来审视自己。

创作中,我们努力让作品染上一抹具有人文关怀和教育洞察的暖色,不为

会让你心头一紧,甚至眼泪流下来。这就是演员在表演中迸发的真情实感,透过人物穿透了你。好的表演一定是准确的。

演员的成功,很像导演的成功,就是一部好电影,一个好角色,留存于人们心中。心里的丰碑是永远的丰碑,不是数字,不是票房,不是奖项,是在心里。就像很多年以后,你都老去了,碰到一个人对你说:“我很喜欢你的电影,它几乎改变了我。”这才是最大的满足。哪怕只有一个人这样表达,你也会知道,这就是作品的力量。

记者:色彩的运用,是您作品中鲜明的风格。《红高粱》《英雄》是浓烈奔放的色彩,《影》是水墨画一样的色彩,《悬崖之上》也是以黑白两色为主。

张艺谋:色彩的选择,首先要根据故事和人物,要准确,而不是去“玩”色彩。《悬崖之上》为什么用黑白两色?因为我记得,对于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,生活本身就是非黑即白,没有缝隙,没有妥协。再加上故事发生在冬季的东北,我要求雪一直下,所以影片中大部分用真雪来呈现白雪皑皑的主色调。

“未来的大师,一定会在年轻人中产生”

记者:过去,您基本每一年或每两年出一部新作,近来创作的速度明显加快了。为什么这两年创作激情涌动,而且影片类型差别很大?

张艺谋:最近两年半完成了4部电影,按照我的精力和能力来说,这是正常速度。过去没有,主要是剧本跟不上,剧本打磨的时间太长,或者我的手中没有存货。很希望我们的文学创作能更加繁荣,有更多文学文本可以供影视改编。现在更难了,平台多了,网剧、电视剧各种影视作品都在拍,好剧本也很难抢到。看到一部好电影,我就会感慨:我怎么没碰到这么好的剧本!

记者:作品出来总会接受观众的品评。您拍过很多电影,也拿了不奖项,还会在意不被理解,甚至遭遇差评吗?

张艺谋:一个作品出来,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,谁都是开心的。如果得到的反馈都是吐槽,票房也不好,那肯定有挫败感。我自己心里有个标准,是“三三制”,即你的所有作品里有1/3是好作品,1/3是达标的,1/3是一般、不够好的。这世上哪有天才,哪能每一部都是天才之作,创作总是艰难的。电影是遗憾的艺术,但这就是电影的魅力,我希望自己的下一部能更好。

记者:您常说,中国电影不缺观众,缺好作品。您怎么看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?

张艺谋:说一千道一万,好电影最为关键。我所说的中国电影,不是单一的标准,而是说能代表中国走向世界,在全世界引起反响的电影。走向的好电影还是太少。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中国,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下,我们仍然可以进电影院看电影,可以进行电影创作,可以恢复电影产业,这是多好的事情。所以,我们的责任、我们的创作,都应聚焦在好电影上。

中国拥有非常大的电影市场,而且发展势头很好,但能匹配这个市场规模的好作品还不够多,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好电影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,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!我看好现在的年轻人,他们有爱国热情,他们聪明、领悟力强,我相信,未来的大师,一定会在年轻人中产生。

图①:《悬崖之上》剧组在拍摄雪景。图②:导演张艺谋在拍摄现场。版式设计:蔡华伟

应试教育推波助澜,用一种正大的价值观去影响人们的选择。当然,小说和电视剧不能靠说教来引领受众,而应是艺术手法、情节逻辑、场景呈现、情绪感染,与受众达成“共情”,在共情中让内心变得柔软,思考便悄然发生。

我在《小别离》中曾写过这个场景:朵朵学得很难,深夜母亲走进女儿的卧室,借着窗外透进来的灯光,她端详孩子的脸庞,忽然想起14年前躺在产房里,护士抱着她来给自己看的那个下午……此刻,我想对为人父母者说的只有一句话:“再焦虑,也不要忘了与孩子最初的相遇。”

温暖,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。从生活表象中提炼暖的力量,这是文艺作品动人的诀窍,也可能是它在当下的使命。别小看它,因为它,你在焦虑时会从容一些,会理性地权衡“舍”与“得”。

故事里的暖光,照在我们身上,世界会因我们每一个人的改变,而有所改变。

